

# 北京“大都会区”的界定与探讨\*

王 放 陈金永

**【摘 要】**文章利用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国际上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界定的原则和方法,尝试对“六普”时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进行界定,从而为在中国如何界定“大都会区”的范围提供了一个研究案例,同时也将国际上“大都会区”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城市 and 城市化研究。文章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一套既适合当前快速城市化和郊区化、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大都会区”的界定方法及数据系统,使中国的城市地域划分与国际上的城市地域划分相吻合。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的不同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状况相互比较,并与世界上其他城市进行正确的比较,从而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情况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关键词】**北京 大都会区 城市化区域

**【作 者】**王 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陈金永 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

国际上利用“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的概念来进行各国大城市规模的国际比较和大城市社会、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中国目前还没有采用一种恰当的方法来对某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范围进行界定。如何确定中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国际上对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统计,如人均指标(如人均GDP)、平均住房价格、失业率等的统计,以及城市规划,都是以一个恰当的“大都会区”范围为基础进行的。一个大城市如果没有对“大都会区”的地理界线进行界定,或“大都会区”的地理界线界定得不正确,不仅会造成对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错误估计,影响城市与城市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确比较,也不利于合理地进行城市规划(陈金永,2010)。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利用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界定“大都会区”的方法,尝试界定“六普”时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并讨论中国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的界定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北京“大都会区”界定方法的探讨,阐明正确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将国际上通用的大城市统计的概念、方法和手段

\* 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郊区化过程中的人口合理分布研究”(项目编号:11SHB010)的研究成果。

引入中国的城市 and 城市化研究,使中国的城市 and 城市化研究能够与国际接轨,同时也有利于科学地评价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北京市合理地进行城市规划。

## 一、研究目的

### (一) 界定“大都会区”的必要性

在中国,由于特殊复杂的行政单位结构,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的行政区域不仅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上“市”(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地域)的范围,更超出了国际上所采用的“大都会区”的地域范围。目前在中国,通常的“市”是一个行政单位,所以某个市的面积和人口就是以该市的行政区域界线为基础来进行统计的。然而,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泛实行市管辖县的行政体制,许多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行政区划上不仅管辖市辖区,还管辖县级市和市辖县,从而包含了广大的农村地域和农业人口,实际上是旧的省管辖的“地区”。此外,1990年以后,中国的地级市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伴随着有的县级市被撤销并设立为地级市市辖区,市辖区数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新增加的地级市和市辖区包含了较多的农村地区,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较大(陈金永,2010)。因此,即使只按市辖区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积和人口进行统计,对有的城市来讲也会包含较多的农村地域和农业人口。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许多城市地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地区,市辖区的地域大大超过“都会区”的范围。

中国对“城市”的界定与国际上通用的定义不同,国内对城市和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上的不确切,也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某些特大城市人口的错误统计和报道,这不仅影响国内外对中国城市 and 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正确认识,也影响中国的城市 and 城市化发展的国际比较。如果要将中国城市 and 城市化的发展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真实反映中国城市 and 城市化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应当使中国的城市统计口径与国际上的城市统计口径相吻合。要使中国的城市统计与国际上通用的做法相一致,标准化的做法就是使用“大都会区”的概念对中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范围进行界定,或者说要确定各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的界线;在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排序时,也应当以“大都会区”的人口为依据。

在中国,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也有多种口径。从统计的地域范围看,有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行政区域进行统计的,统计范围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和县;有只按市辖区的范围统计的,统计范围不包括县级市和县。从统计的人口范畴来看,有按城市的行政区域或市辖区常住人口统计的,也有按户籍人口统计的。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往往造成同一个城市有多个人口数据,从而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和统计上的前后矛盾。鉴于国内外在中国城市人口统计数字上的混乱,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既适合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和郊区化(特别是郊区化)、又与国际接轨的大城市“大都会区”的统计分析方法及数据系统(陈金永,2010)。

### (二) 界定北京“大都会区”的意义

1. 对北京“大都会区”进行界定可以使北京市的人口统计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目前北

京市的行政区域分为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和延庆 16 个区、县,其中除了密云和延庆为县以外,其余为市辖区。在《世界城市化展望(2011 年修正版)》中,北京市以 1 559 万的人口规模排在世界上前 30 个特大城市的第八位。根据 2012 年《北京统计年鉴》,2011 年年末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为 2 018.6 万,户籍人口为 1 277.9 万;北京市 14 个市辖区的常住人口为 1 939.6 万,户籍人口为 1 207.1 万(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2)。联合国公布的北京市人口数据与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很大的出入。由于北京市的行政单位结构与国际上其他特大城市的行政单位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市的行政区域和市辖区包含了广大的农村地域,因此,在与国际上其他特大城市进行人口规模比较时,不能将北京市行政区域的人口或市辖区的人口作为北京市的人口来进行比较,而应当采用国际上界定城市的方法,对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进行界定,这样才能够将北京市的人口规模与国际上其他特大城市进行合理的比较,并正确地体现北京市的人口发展状况。

目前国内各有关部门对于北京市人口的统计存在口径不一致的情况,如《北京统计年鉴》是按照北京市行政区域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来进行统计的;《中国统计年鉴》是按照北京市行政区域的常住人口来进行统计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是按照北京市行政区域和市辖区的户籍人口来进行统计的;而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4 年 3 月 16 日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sup>①</sup>又是以北京市市辖区的常住人口来进行统计的。此外,同一个统计部门对北京市不同指标的统计也存在口径不一致的问题。201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发布的北京市人口数据是户籍人口数据,但发布的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又是按照常住人口进行计算的。北京市的人口和其他指标统计口径的不一致,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因此,应当采用国际上的标准统计方法,以北京“大都会区”为单位对北京市人口进行统计。如果国内其他大城市也能以“大都会区”为基础对城市人口进行统计,就可以有效地进行城市之间的国内、国际比较。

2. 对北京“大都会区”进行研究有利于科学地评价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过去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行政区划中,位于城市中心的城市化区域及一些离市中心较近的城市建成区和农村地区被划分为市辖区,即市区,而其余的农村地区则被划分为县。由市辖区组成的区域也称为城市行政区。城市行政区虽然并不等同于城镇地区(即按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划分城乡的规定而划定为城镇的区域)<sup>②</sup>,但从各方面的特征来看却应当主要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然而,1990 年以后,中国大量的县被撤县设区。许多由县改区的行政单位无论是从居民的就业结构还是从人口密度等指标来看,都与真正的市区有很大的差距,实质上仍然是农村地区。1997~2001 年,北京市先后撤销通县、顺义县、昌平县、大兴县、怀柔

① 人民网(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17/c1001-24649809.html>)。

② 城市行政区比分布于其中的城镇地区范围更大。

县、平谷县,设立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虽然有的县在行政上被撤县设区,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特征上仍然主要属于农村。例如,2010年“六普”时,怀柔区常住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比重达65.46%,其人口密度只有176人/平方公里,仅高于延庆县;平谷区的常住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比重达57.86%,其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口比重达32%,仅次于延庆县(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12a)。

将主要属于农村地区的县撤县设区,导致北京市的城市行政区变成了城市和农村的混合体,城市的特征淡化,直接降低了北京市市辖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社会、经济指标值,从而影响对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确评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或平均消费购买力的典型指标。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北京市行政区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81 658元,市辖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83 777元。北京市的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唐山、沧州、呼和浩特、鞍山、松原、镇江、杭州、宁波、温州、合肥、九江、烟台、长沙、玉溪等城市。这些城市的市辖区数量较少,城市行政区覆盖的农村地域范围较小,所以其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北京;但由于北京市没有辖县级市,而上述那些城市所辖的县级市或县数量相对比较多,所以其行政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北京(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2013)。由此可见,无论是用市辖区的人均指标,还是用城市行政区域的人均指标,都不能将北京市与国内其他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正确的比较,不能如实反映北京市及其他城市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科学地评价各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北京市及其他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需要用统一、规范的方法对其“大都会区”的范围进行界定,并在“大都会区”的基础上进行比较。

3. 由于不能正确地界定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导致国内一些学者在对北京市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时得出了一些不合理的结论。例如,冯健等人所界定的北京“大都会区”的外缘地带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地区(Feng等,2009),而这种界定有悖于“大都会区”的概念,因为“大都会区”的边缘地带恰恰是由于郊区化而人口增长率提高较快的地区<sup>①</sup>。由于冯健等人界定的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过大,包含了大量农村地域,所以他们得出了2000年“五普”时以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区域仍然是北京“大都会区”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错误结论(Feng等,2007)。因此,建立正确的北京“大都会区”的概念,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 二、对“大都会区”的界定

### (一)“大都会区”的特征

“大都会区”由城市中心(即城市化区域)和与之相邻的外围区域(即郊区)组成。每一个“大都会区”的面积都比位于其中心的城市化区域大得多,而且包含了一些在自然特征方面与主城区明显不同的社区,因此,其人口也比城市化区域多得多。衡量外围区域与城市中

<sup>①</sup> 在新的郊区(也就是都会区的边缘)人口增长率特别高,这在中国更为明显,因为大多数新的外来人口住在郊区(如北京的“城中村”基本上在郊区)。



心融合度的最常用指标是从外围区域通勤到城市中心上班的人口数据。例如,美国采用的通勤标准是,如果一个县有 25% 的就业人口在城市中心和居住地之间通勤,则这个县就属于“大都会区”;而加拿大的相应标准是,如果一个县的下一级行政单位有 50% 的就业人口在城市中心和居住地之间通勤,则这个行政单位就属于“大都会区”<sup>①</sup>(Forstall 等,2009)。

人口密度是确定城市化区域范围的常用指标。在美国,城市化区域是指围绕着一个较大的城市或其他的城市社区呈连绵状分布的高人口密度区域,其界线并不一定与行政边界一致。美国普查局用普查小区的人口密度来确定城市化区域的范围,将人口密度在 500 人/平方英里及以上的小区划入城市化区域,并且规定一个城市化区域的总人口不得低于 50 000 人。日本将人口密度 4 000 人/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普查区作为类似城市化区域的地区,其对人口密度的要求比美国高得多。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国家则以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为基础定义城市化区域。

“大都会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人口居住密度较高;(2)非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3)具有高度的内部融合,是一个一天内统一的劳动市场和房产市场,是居民一天的生活圈。在具体操作方面,美国学者 Forstall 等(2009)认为,“大都会区”除了拥有围绕着一个城市的连绵的城市地区以外,还应当包含达到以下两个标准的社区:(1)居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及相关行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的劳动力比重小,如低于 35%;(2)有一定比例的每天到城市中心地区的通勤人口。例如,至少有 20% 的就业人口在通勤。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情况,还可以加入其他界定“大都会区”的标准。一般来讲,“大都会区”所包括的地域应当明显比更远的农村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此外,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还可以考虑零售业或批发业的情况,以反映与城市地区明显的商业交换。

## (二) 确定“大都会区”的步骤

许多国家都官方定义了“大都会区”,有些国家还同时定义了城市化区域。由于各个国家官方定义使用的标准有所不同,从而会给国与国之间“大都会区”的比较带来不便,因此,为了使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城市地区能够更好地进行比较,Forstall 等(2009)提出了国际上长期使用的确定“大都会区”的原则和标准,根据这些统一的标准界定的不同国家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叫做“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他们还提出了确定“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的具体步骤。步骤一:根据较新的地图和卫星图像,确定连绵的城市化区域的大致界线。如果有官方公布的城市化区域的定义,一般应采用官方定义。步骤二:由于人口普查的数据是按普查单位或普查小区给出的,因此利用标有最新的人口普查单位行政界线的地图,对所研究地区的城市化区域进行调整,得到调整的城市化区域,使调整的城市化区域的范围与普查小区的界线相吻合。步骤三:利用最新的人口普查所获得的各个行政单位或普查小区的人

<sup>①</sup>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使用的“大都会区”的最小构成单位的范围大小不同,如美国的“大都会区”的最小构成单位是“县”(county),而加拿大的最小构成单位是县的下一级单位(county subdivision),通常比美国的县要小得多,因此对通勤者要求达到的百分比也有不同的要求。

口数据和面积数据,得到在调整的城市化区域的周边地区各行政单位(在中国为乡、镇、街道)的人口密度,并对在调整的城市化区域的周边地区人口居住的特征有大致的了解。步骤四:利用有关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工作地的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数据,确定在调整的城市化区域的外围地区每一个行政单位的就业人口中向调整的城市化区域通勤上班的就业人口比重。步骤五: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确定每一个行政单位的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和相关行业的人口比重。在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很小的国家或地区,这一步骤可以不考虑。步骤六:通常把“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定义为包括所有连绵分布的、满足以下条件的行政单位:在不到35%的常住就业人口从事农业的条件下,至少有20%的常住就业人口在调整的城市化区域工作。当然,这个条件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对于一些例外的情况还需要特殊处理。步骤七:如果不能获得有关通勤上班的数据,则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确定在调整的城市化区域的外围地区每一个行政单位的人口增长率和在调整的城市化区域内的外缘地带的人口增长率。如果与整个研究地区相比,有的外围单位具有相对较快的人口增长率,而且满足非农就业标准,则将这些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的外围单位划入“大都会区”的范围,从而得到“大都会区”的大致界线。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密度也是有用的参考指标。步骤八:如果一个地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较高,但缺乏所需要的子地域层面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而一个子地域具有较快的人口增长率和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口密度,也可以将其划入“大都会区”的范围<sup>①</sup>。

Forstall等人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不完整的资料对北京“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进行了初步界定。他们利用上述确定“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的步骤二、步骤三和步骤五得到了北京“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的大致范围(见图1)。由于不能获得北京市街道(镇、乡)之间的通勤数据,也没有北京市各街道(镇、乡)“四普”时的人口数,无法利用上述步骤七的替代方法,所以他们确定的范围只能视为初步界定。

图1中的阴影部分是北京市的城市化区域,是根据乡级行政单位的人口密度来确定的,包括了当时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石景山区的全部,朝阳、丰台、海淀区的大部分及门头沟、通州、昌平、大兴区的一小部分地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该北京市城市化区域人口为877.58万人,面积为115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7572人/平方公里,在“四普”到“五普”期间人口增长了21.7万人,年平均增长2.85%。图1中粗黑线所包括的范围是北京“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包括了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区的全部和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和大兴区的一部分。2000年“五普”时该北京“大都会区”的人口为1026.36万人,面积为2747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736人/平方公里,在“四普”至“五普”期间人口增长了27.4万人,年平均增长3.12%。

① 这一步骤对于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在同时经历城市化和郊区化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会促使人口(包括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外来人口等)向大城市的郊区迁移,从而使郊区的一些地域比其他地域具有更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更高的人口密度。

### 三、“六普”时的北京“大都会区”

目前,国内外学者只是对北京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例如,冯健等人所采用的“五普”时的北京“大都会区”包括了除怀柔、平谷、密云、延庆4区、县以外的北京市其他14个市辖区的行政区域。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个北京“大都会区”的人口为1218万人,面积为907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343人/平方公里(Feng等,2007)。我们认为这个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太大,而且是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界定的,不符合“大都会区”的确定原则,因此不是真正的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郑思齐等人所引用的由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所定义的

北京“大都会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区的全部及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和昌平区的一部分,面积为1086平方公里(Zheng等,2009),比冯健等人所讨论的北京“大都会区”小得多,但却没有给出界定方法,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这个“大都会区”范围太小。

城市化区域(城市中心区)和与之相毗邻的外围郊区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都会区”。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城市化区域逐渐扩大,原来的郊区变成了新的城区,在新的城区的外围又形成了新的郊区,从而使“大都会区”的范围逐渐扩大。这样的一种“大都会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郊区化的过程。在郊区化的过程中,“大都会区”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城市中心和更远的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大城市尤为突出,因为不但有户籍人口因旧区改造而搬迁到郊区,进城的流动人口也主要集中在郊区(如郊区的“城中村”)。因此,我们认为,在缺乏通勤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五普”至“六普”期间北京市各乡级单位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对北京“大都会区”的地域进行大致的界定,即将年平均人口增长率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的乡级单位划入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在“五普”至“六普”期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增长了44.54%,年平均增长3.75%。由于一些乡级单位的人口增长率特别高,从而提高了北京市人口增长率的平均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可以采用年平均人口增长率3%作为判断“六普”时北京“大都会区”界线的主要标准,同时也参考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等其他指标。

我们根据北京市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北京市各乡、镇、街道的土地面积数据(北京市民政局,2008)计算了在“五普”至“六普”期间北京市各乡级单位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和“六普”时各乡级单位的人口密度,同时也根据北京市各区县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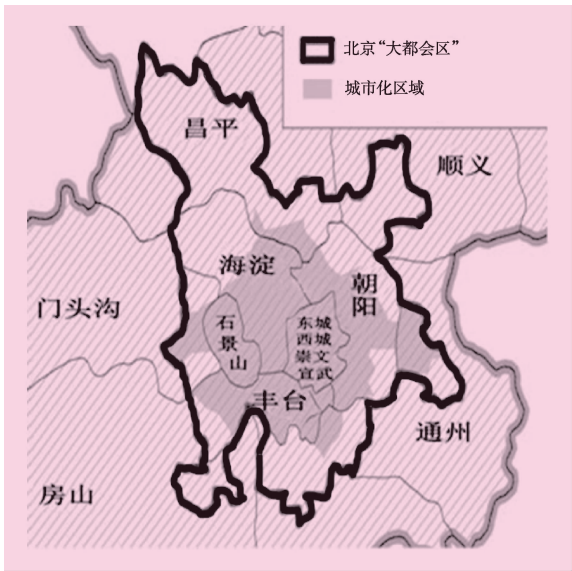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  
资料来源:Forstall等,2009。

的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了各乡级单位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由于目前北京市“六普”资料没有居住在郊区的人口向城市中心通勤上班的数据,因此我们根据上述 Forstall 等(2009)提出的确定“大都会区”的步骤二、步骤三、步骤五和步骤七,尝试对“六普”时的北京“大都会区”范围进行界定。具体的界定方法是:(1)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在标有乡级单位界线的北京地图上,根据各乡级单位的人口密度,同时考虑到城市化区域的连绵性,将人口密度大于 2 000 人/平方公里的乡级单位划入北京“大都会区”里的城市化区域、即城市中心区的范围;(2)将位于郊区的在“五普”至“六普”期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大于或接近 3%的乡级单位划入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考虑到“大都会区”地域的连绵性,如果在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大于 3%的乡级单位中间分布着个别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小于 3%的乡级单位,也将其划入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一般要求划入北京“大都会区”的乡级单位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小于 35%,同时人口密度大于 500 人/平方公里。

我们所界定的“六普”时的北京“大都会区”如图 2 所示。图 2 中的点线所包括的整个阴影部分为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包括:东城区(原东城区和原崇文区)、西城区(原西城区和原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的全部,门头沟区的大峪街道、城子街道、东辛房街道、永定镇和龙泉镇;房山区的新镇街道、星城街道、良乡地区、拱辰街道、西潞街道、阎村镇、窦店镇和长阳镇;通州区的中仓街道、新华街道、北苑街道、玉桥街道、永顺地区、梨园地区、宋庄镇、张家湾镇、马驹桥镇、台湖镇和潞城镇;顺义区的胜利街道、光明街道、仁和地区、后沙峪地区、天竺地区、牛栏山地区、南法信地区、马坡地区、石园街道、空港街道、双丰街道、旺泉街道、高丽营镇、李桥镇和南彩镇;昌平区的城北街道、马池口地区、沙河地区、城南街道、回龙观地区、东小口地区、阳坊镇、小汤山镇、南邵镇、崔村镇、百善镇和北七家镇;大兴区的兴丰街道、林校路街道、清源街道、亦庄地区、黄村地区、旧宫地区、西红门地区、瀛海地区、观音寺街道、天宫院街道、青云店镇、北臧村镇和魏善庄镇。“六普”时该北京“大都会区”人口为 1 659.68 万,面积为 3 740.51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4 437 人/平方公里,在“五普”至“六普”期间人口增长了 582.30 万<sup>①</sup>,年平均增长 4.42%。

图 2 中北京“大都会区”中心的深色阴影部分为北京“大都会区”中城市化区域的范围,包括:东城区(包括原东城区和原崇文区)、西城区(包括原西城区和原宣武区)、石景山区的全部,朝阳区除孙河地区、金盏地区和首都机场街道以外的地区,丰台区除长辛店街道、云岗街道、长辛店镇和王佐镇以外的地区,海淀区除香山街道、温泉镇、苏家坨镇和上庄镇以外的地区,门头沟区的大峪街道、城子街道、东辛房街道和龙泉镇,通州区的中仓街道、新华街道、北苑街道、玉桥街道、永顺地区和梨园地区,昌平区的沙河地区、回龙观地区、东小口地区和北七家镇,大兴区的兴丰街道、林校路街道、清源街道、亦庄地区、黄村地区、旧宫地

① 该人口增长数据是将“六普”时北京“大都会区”人口数量减去“五普”时相同地域的人口数量而得出的。



区、西红门地区、观音寺街道和天宫院街道。“六普”时该城市化区域人口为 1 391.87 万,面积为 1 592.37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8 741 人/平方公里,在“五普”至“六普”期间人口增长了 480.49 万,年平均增长 4.33%。

#### 四、对北京“大都会区”的讨论

虽然界定北京“大都会区”的标准稍有不同,但如果将图 1 和图 2 进行比较仍然可以看出,在“六普”时无论是北京“大都会区”的面积和人口,还是北京“大都会区”中城市化区域的面积和人口都比“五普”时大大增加。与 Forstall 等(2009)根据“五普”资料所界定的北京“统一定义的大都会区”相比,“六普”时无论是北京“大都会区”的面积、还是北京市城市化区域的面积均向北、东、南 3 个方向有了很大的扩展。“六普”时北京“大都会区”的面积覆盖了昌平区、顺义区、通州区和大兴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北京市的城市化区域也在昌平区、朝阳区和大兴区的地域里进一步向北、东、南延伸。“五普”至“六普”期间,北京市的城区面积迅速扩大,郊区化也有很大的发展,从而导致人口增长率高的乡、镇、街道向北、东、南 3 个方向扩展,人口密度高的乡、镇、街道也向远郊地区推移,使北京“大都会区”和城市化区域的面积迅速扩大。

我们界定的“六普”时北京“大都会区”的人口比北京市城市化区域的人口多 19%,面积比北京市城市化区域的面积大 135%。但是,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却只占整个北京市行政区域面积 16 411 平方公里的 23%,人口是“六普”时北京市行政区域人口 1 961.24 万人的 85%。这样的一种“大都会区”和整个城市的行政区域的关系是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特色。在国际上,如在欧洲和美洲,几乎所有大城市的行政地域都只是其所属的“大都会区”的一部分,在城市行政边界以外有许多属于“大都会区”的郊区地域,也就是说“大都会区”的面积比市的行政面积更大。但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行政区域面积往往比城市地区大得多,一般都包括了广大的农村地域及其小城镇。“六普”时除了我们划定的“大都会区”的范围以外,北京市其他地区以农村地域为主。由于有地级及以上城市领导县级市和县和县的体制,因此,不能将中国(大城)市行政区域的人口和范围简单地与国际上“大都会区”的人口和范围进行比较,即使在中国的同级城市之间也不能用行政区域的面积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进行比较。此外,北京“大都会区”的面积只是北京市 14 个市辖区面积 12 187 平方公里的 31%,人口只是“六普”时 14 个市辖区总人口 1 882.73 万人的 88%。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和范围与国际上的“大都会区”进行比较。城市之间的比较应当是在“大都会区”概念基础上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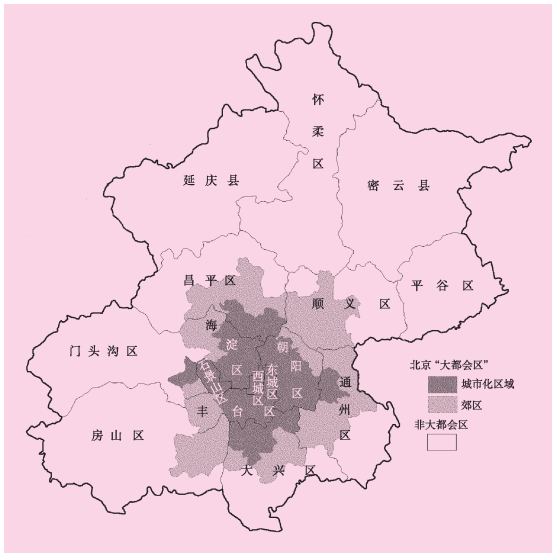


图 2 “六普”时的北京“大都会区”

## 五、结 语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对在中国如何界定一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并对北京“大都会区”的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定。由于缺乏从郊区向城市中心通勤的数据,本文根据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所划定的北京“大都会区”的界线还不够精确。但本研究表明,对中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进行大体界定是有方法可循,并值得探讨的。根据 Forstall 等(2009)的方法,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人口数据,对一个城市的“大都会区”的范围作出大体合理的划定,使之成为一个国内外有可比性的标准口径。当然,“大都会区”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的发展。

本文对北京“大都会区”的界定只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探。关于中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大都会区”的研究还有许多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需要完成。如何将本文所界定的北京“大都会区”运用于北京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从而促进有关北京城市发展的各项合理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学者、政策制定者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2):《北京市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乡、镇、街道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北京市民政局(2008):《北京市行政区划手册》,中国旅游出版社。
3.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2):《北京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4. 陈金永(2010):《当前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问题及其对经济分析的影响》,载于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1——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2013):《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6.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7.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a):《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8.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b):《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9. Feng J., Zhou Y., Logan J. and Wu F. (2007), Restructuring of Beijing's Social Spa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8(5): pp.509-542.
10. Feng J., Wang F. and Zhou Y. (2009),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Population Metropolitan Beijing: Toward Polycentricity in Post-Reform Era. *Urban Geography*. 30(7): pp.779-802.
11. Forstall R., Greene R. and Pick J. (2009), Which Are the Largest? Why Lists of Major Urban Areas Vary So Greatl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0(3): pp.277-297.
12.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2),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http://esa.un.org/unup/>).
13. Zheng S., Long F., Fan C. and Gu Y. (2009), Urban Villages in China: A 2008 Survey of Migrant Settlements in Beijing.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4): pp.425-446.

(责任编辑:朱 犁)